

聚焦互联网时代下的青年婚恋——

当代大学生婚育性别需求差异显著

- ★ 男大学生更在意婚育成本；女大学生更在意自我发展机会
- ★ 女性更偏好来自机关事业单位的配偶或外企配偶；对男性而言，如果潜在配偶在外企或民企工作反而是个减分项
- ★ 男性对于配偶外貌的排序高于女性；女性对于房产、教育的排序高于男性
- ★ 男性对婚育更加期待；女性则对婚育风险，特别是生育风险的感知大于男性



大学生婚恋行为受到社会普遍关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当今中国处于社会快速转型阶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青年人的婚恋行为及婚恋观念。大学生作为青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准确、全面、深入地了解 and 把握当代大学生的婚恋情况非常有必要。”近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等主办的“中国大学生婚育观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阐述了研讨会举办的重要意义。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就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的婚恋观、择偶偏好以及网络行为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大学生选择配偶看重经济实力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展示了大学生婚育观相关调查报告。调查抽取的样本来自30所高校，包括4所双一流高校，18所普通高校，8所专科医院，覆盖22个省份26个城市，有效问卷共9775份，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总结调查结果，李婷介绍，首先，大学生仍然对婚姻和生育有所期待，但婚育的价值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次，大学生面临的婚育阻力较大，且呈现出显著的性别需求差异。男大学生更在意婚育成本，女大学生更在意自我发展机会，这体现了不协调的性别观念转变进程，所以必须考虑统合两性需求的公共政策。另外，大学生整体精神面貌积极乐观，但焦虑问题也普遍存在，同时，互联网从各个维度影响塑造了大学生的观念，形成明显的圈层文化。

为进一步探究大学生在择偶和生育方面的态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王东晖发布了《当代大学生的择偶偏好与生育观：基于选择实验的发现》。

在择偶偏好上，王东晖表示，大学生倾向于年龄小、长相佳、教育水平高、有房、独生子女以及高收入的配偶。但男女对配偶的职业偏好不同：女性更偏好来自机关事业单位的配偶或外企配偶；对男性而言，如果潜在配偶在外企或民企工作反而是个减分项。

进一步通过意愿支付价格，即你愿意放弃配偶的收入来换取他的其他属性，你愿意放弃配偶的收入越多来换取的那项，就是你最需

要的因素，并依次排序。调查结果显示，由大到小的属性依次为：年龄、房产、教育水平、外貌、是否为独生子女、职业。但男女偏好排序也是稍有不同，男性对于配偶外貌的排序高于女性，女性对于房产、教育的排序高于男性。

“总体而言，当代大学生对于配偶属性的选择偏好突出了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但存在性别差异。”王东晖说，这反映了中国家庭的“变”与“不变”。

婚育观需纳入性别议题的讨论

“大学生作为青年人中思维和行为最活跃的代表，引领着整个青年群体的婚育观念。大学生婚育行为的变化，代表着年轻人的变化潮流。”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

济学教授原新表示。

原新非常关注两份报告中关于两性婚育观差异的观点，“两份报告结果都显示，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在婚育的心理和行为方面都表现得更加谨慎，体现在男性对婚育更加期待，女性则对婚育风险，特别是生育风险的感知大于男性。”分析原因，原新认为，一个是因为女性是生育的直接承担者，另一个是受性别不平等因素的困扰，女性仍然要从事更多的家庭照料、在职场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等，这让女性感受到更大的生育压力。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于嘉同样关注到两性差异，她认为，对于大学生婚育观念的讨论，需要纳入性别议题的讨论，因为婚姻和生育本身就是两性的问题。就目前情况看，特别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性别环境，比如女性普遍认为，生育可能会给自己在就业、升职、收入上带来一些影响。而如果不能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困境，就不能解决女性在婚育方面的态度。“目前，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在多个阶段都已经超过男性，如何把教育优势转化到劳动力市场，这会影响到女性相关的家庭行为。”

同时，原新非常认同李婷的《中国大学生

婚育观报告》中关于互联网对大学生群体影响的结论。报告显示，大学生休闲上网的平均时间为4.5个小时，而休闲上网时间越长婚育意愿越低。“休闲上网为4.5个小时，加上正常在网上的学习时间，一天中在电脑或手机上的时间很长。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有一定影响，同时，势必会减少线下人际沟通的能力和机会。而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都需要线下真实的沟通和生活。”

报告还显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是大学生恋爱的最大阻碍”，于嘉此前曾听到不少大学生表示“没有良好的社交平台”，因此她认为，除了线下时间的减少，交友渠道的限制也会阻碍大学生发展恋爱对象，进而影响他们的恋爱行为和意愿。

报告背后的多项内容值得进一步关注

“两份调查报告有很多创新点，对年轻人未来的结婚和生育意愿，以及性别差异做了详细的呈现，为今后的研究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他建议，对于作为未来生育主体的大学生，应该给予更多方面的关注，比如应增加婚育观背后的原因分析、婚育观背后的家庭和社会因素、婚育观与人生目标的关系、婚育观与未来婚育行为变化的轨迹、影响婚育观的中介机制等，“要加强纵向数据的收集和研究、挖掘调查结论的政策内涵。”

通过调查报告内容，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刘汶蓉提出了三方面的期待，她表示，近年来，女性受教育程度在不断上升，但女性对婚姻的满意度却在不断下降。如何解决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让两性之间达成对婚姻的共识，值得进一步探讨。

调查显示，不同网络行为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婚育观，因此，刘汶蓉认为，要正确引导青年人的婚育行为，首先需要了解这个群体在互联网背后的真正心理，才能得出哪个环节的政策干预对于青年人的影响最大、最有效。

同时，刘汶蓉提出，恋爱是自我成长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有了恋爱才有之后的结婚生育。但目前的现实是，青年人的恋爱意愿和恋爱行为都有所减少，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

于嘉提出，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现状会影响大学生群体的婚育观念和意愿。“比如新闻里曝出的一些婚恋方面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如果未来婚育的主力军群体看到此类事件没有好的处理结果和预期，势必会影响他们的未来选择。”

“我们现在虽然要鼓励婚育，但也要尊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于想生育的群体，我们要尽量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政策。对于不想婚育的人群，也要尊重他们的需求，社会导向要尊重大家的不同选择。”于嘉表示。

当妈为何越来越难

■ 施芸卿

育儿焦虑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当妈难”背后的社会结构核心问题是：社会变迁进程中，抚育责任在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之间，被不断地重新界定与组合，进而限定到母亲身上，并被层层加码。

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使中国产生了庞大的工作母亲群体。转型之后，单位制解体，公共托幼体系瓦解，“工作母亲”面临着市场化对其双重身份提出的挑战，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

除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全方位建构外，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母职的精细化程度还围绕着儿童成长的诸多环节被纵向展开，尤其体现于教育领域。“教育拼妈”和“父亲缺席”并存。城市家庭中的母亲角色突破了私领域内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母亲教育职责陡增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从这个意义上，当今的合格母亲，需要拥有一种在“公”与“私”之间自由穿梭的能力，对母职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近年来，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为自己而活”的理念被广泛接受，女性对自我形象与个人发展产生相当的需求和期待。但女性对个体自主的追求，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同样极易陷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潭，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有可能造成对女性更强的压迫，并对亲子关系的实质产生了挑战。

美“鸡娃”式教育也受质疑

■ 李昂然

家庭教育与父母参与对教育公平产生深刻影响。在媒体的聚焦下，“鸡娃”式育儿成为公众关注的重要社会现象。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和狂热参与并不是我国独有。

那么，高强度和高密度的父母教育参与对子女的成长究竟有什么影响呢？其影响是否存在阶层差异？

大多数学者、父母和教育工作者都同意，父母教育参与对孩子的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发展是有益的。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下，父母的积极参与被认为是提高孩子教育成果的最佳途径之一。美国教育政策制定者通过立法和各项推动举措，以增加来自不同阶级和种族/民族背景的家庭的父母参与。受此影响，“参与式父亲”和“密集母职”文化逐渐兴起。因此，父母参与孩子的教育活动和认知发展迅速成为一种规范性社会行为。

然而，美国父母教育参与的显著增加的趋势并非没有受到质疑和批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过度父母教育参与对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会造成负面心理健康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关于美国过度父母教育参与的实证研究都集中在高中和大学生身上，研究学者认为，社会经济优势家庭比弱势家庭更有可能过度参与孩子的教育，提出了父母过度参与的可能性是否只存在于富裕家庭。迄今为止，关于父母过度参与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小学生的潜在影响知之甚少。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教育参与会带来更高水平的学业成就和更低水平的内化心理健康问题。与中等程度的父母参与相比，高强度和密度的父母教育参与并不能带来更好的回报和效果。此外，我们发现这种过犹不及的关系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中基本一致，这表明父母过度参与和学生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具有社会经济优势的家庭。

因此，教育政策制定者在鼓励更多父母参与到孩子教育的同时，更加需要正确地引导父母合理科学地参与，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共筑良好的环境。

中国的大龄剩男在哪里？

■ 李婷 武翰涛 董浩月

利用2010年普查的微观数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县级35岁以上未婚男性的比例。可以看出我国大龄剩男比较集中的有几个区域：安徽南部连接浙江西南部地区、河南西部连接陕西南部和湖北西部成片区域、广西北部连接贵州东南和湖南南部地区、云南西南部，以及川西滇北的藏族地区。

决定大龄剩男多少的因素在于，长期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会造成适婚年龄男女比例失衡。根据婚姻梯度理论，女性总是倾向于“向上婚”，从不发达地区到更发达一点的地区就是一种“向上婚”。那些被剩下来的往往是穷困地区最弱的男性。

婚姻梯度的存在，天然就会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形成天价彩礼的陋习，而出生性别比会进一步扭曲彩礼的价格。研究发现，适婚人口性别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导致彩礼支出显著上涨2.037%，但是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彩礼支出的影响只发生在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

“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大家谈”⑥

“我们注定是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代。”这句近年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话，虽然有点极端，却并非是对年轻一代的指责，只是正迈进老年门槛的一代人基于独生子女面临的压力，对晚年境况做出的悲观预判，本质上是对未来养老困境的担忧。

家庭的“定心锚”：全方位打造家庭养老友好环境

■ 简云

如今八九十岁的老人虽有多子女协力养老依然困难重重，十几年之后，将是独生子女单挑养老重担，即便有心孝顺，也可能无力承受，家庭养老于是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

如何养老，目前可选择的主要方式有两种：进养老院或者居家。无论哪一种，都需要家人相助，进养老院也并非万事大吉，监护人得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状况，送医转院请护工等，居家养老更是需要家人日夜承担照料责任，即使请了保姆、护工，许多事情也得亲力亲为。因此，老人能否安度晚年，家庭始终是关键一环。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已制定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大战略，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相关内容也被列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国务院近日又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进一步明确推动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工作任务。国家战略虽已确立，但家庭要有效承担起养老重任，则需方方面面的支持，包括地方层面更为具体的政策支持、系统的社区支持、温情的用人单位支持等，合力打造出一个支持家庭养老的友好环境，这也是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部分。

友好的政策支持，对家庭来说就像一个

“定心锚”，让人能从从容应对养老难题。而作为社会最小单元的家庭，立足点是社区，要有效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相关政策应重点推动资源下沉，包括人力资源、医疗资源、设施资源等。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已明确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指标、行动计划和重大工程等，强化社区养老和医疗服务功能也被列入其中，显示了国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社区下沉的政策导向。各地在制定相关政策和落实规划的过程中，也应将资源下沉作为重点。

要强化社区服务功能，人力资源是第一位的。目前社区基层组织普遍存在人员少、资源不足的情况，所以，应适度扩大社区机构，增设人员，鼓励人才到基层就业，加强社区服务家庭、支持家庭养老的力量。同时，扩大社区专业医护队伍，提升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对行动不便或卧床不起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让居家养老的老人能获得方便的医疗服务。

此外，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护理人才，规范管理护工队伍，也需制度保障。如今的护工大多是来自乡村的中年人，未来年轻一代是否愿意干又苦又累的工作的确是个未知数，而目前护工缺乏专业技能也是普遍现象。如何为老龄化社会打造一支庞大的专业护工队伍，减轻家庭照料的重担，是一个颇具挑战性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需要未雨绸缪，

步步推进。

养老院建设是养老服务的重要方面，目前大型或设施较好的养老院大多离城较远，虽有医疗配套但大多医疗水平不高，入住养老院的老人一旦生病，往往得远距离进城就医，一些养老院虽有陪伴就医服务，但很多时候家人还是放心不下，不得不来回奔波，陪老人看病。一些建在社区内的养老院，普遍规模小、设施陈旧、服务水平不高，难以承担社区居民的养老。如果能在社区建设新型、有质量的养老院，将会大大方便老人就医、家人探望和及时援手，这也需要地方政府在养老院选址规划时向城区倾斜，予以政策支持。

支持家庭养老，政策友好之外，社区的服务友好则是家庭的强力后援。目前，一些城市的先进社区在养老服务方面已做出诸多尝试，包括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医疗保健服务、开设社区餐厅并提供送餐服务、建立志愿者队伍提供助老服务、在社区开设“托老所”提供日间服务、开展“老年课堂”“老年沙龙”一类的文化交流活动等，这些尝试和经验值得在所有社区推广。

除此，也可以进一步打开思路，整合资源拓展养老服务范围，助力家庭承担养老功能，比如有意识地引进专业服务机构，在社区建立规范专业的护工、家政队伍，社区予以监督指导，保障老人获得高质量的服务；有条件的社区还可运用信息技术，为居家老人安装装

助系统，实现远程联网，让老人在危急时刻实现一键求助。

在不久的将来，独生子女单挑养老重担的大环境下，用人单位的友好支持也不可或缺。和助力养娃一样，助力养老同样可被视为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关键时刻，能助员工一臂之力。比如，当员工遭遇父母重病或突发意外时，适当放宽事假标准；根据实际情况，为确有困难的员工提供一段时间的父母护理假；建立家庭互助基金，帮助员工度过经济难关等。

来自政策、所在社区和单位的支持可以构建出一个助力家庭承担养老功能的友好环境，但养老责任最终要落到家庭，家庭友好小环境对老人的身心健康、生活质量更有直接影响。家庭内的友好，孝心是基础，能力也很重要，包括照料能力、沟通能力、心理抚慰能力，以及自身的心理平衡能力等。这些能力需要有意识地学习，有步骤地掌握，对家庭成员来说，家庭助老能力建设算得上一项综合工程，只有用心对待，真情投入，才能营造出对老人友好的家庭小环境，和社会友好环境相互呼应。

如果社会友好，家人友爱，内外协力，打造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助力家庭养老的友好环境，那么，养老或许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无论居家还是进养老院，都有一双友好之手随时提供助力，减轻家庭负重，消解老人之忧。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